

# 论新时期以来文化守成小说的主题指向

□张旭东 [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 473004]

**[摘要]** 新时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重新勃兴,小说领域的“文化守成”书写也日渐普遍。归纳来看,这些小说的主题指向主要有:坚持本土精神,回归传统文化;反思工具理性,张扬人文价值;批判城市文明,皈依乡土田园;揭示发展弊端,呼吁生态和谐等。这种创作路向,反映了作家对现代化进程的忧患和反思,以及渴望为中国探寻一条健康、和谐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借鉴的良好愿望。

**[关键词]** 文化守成小说; 主题指向; 传统文化; 人文精神; 乡土文明; 生态和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2)01-0108-05

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整个思想文化界普遍产生了文化保守倾向,而作为生性敏感,天然地倾心于人文精神、尊重人道主义、关心人的全面发展的作家来说,他们在心态上更容易趋向“文化守成”。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各种各样不正常的现象和弊病也逐渐产生:人的物化和异化、意义的丧失、价值的滑坡、道德的沦丧……这让作家们感到不适、困惑、焦虑甚至忧愤,他们开始意识到,现代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如果不对其负面因素做有效制约,则人类非但不能实现自由,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困境。出于知识分子匡时济世的传统情怀,作家们也想通过创作为当下中国找寻适合自身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模式提供借鉴,于是,反思科技和工具理性、批判城市文明和市侩文化、弘扬本土传统和人文精神、呼唤价值理性和生态和谐成了他们创作时的共同主旨。

## 一、坚持本土精神,弘扬本土传统

新时期开始,最初有“返回传统”迹象的是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非主流”作家。当大部分作家还在书写伤痕、反思“文革”、呼唤改革的时候,他们默默地开始了另一种创作路向:张扬传统的精神价值,抒发传统的审美经验。他们的笔下,不再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是日常风俗、人情冷暖、地域风景、节日礼仪。随后,受拉美“文学爆炸”及

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和刺激,中国的一些作家也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寻根文学”运动,他们普遍认为,当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已经被隔断,不仅是文学,几乎中国的整个现代文化都在向西方“拿来”,缺乏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根本不可能在世界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想要创作出“地道的,正宗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到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根”。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sup>[1]</sup>郑万隆则指出:“我不仅是生活在‘现在’,而且是生活于‘过去’的‘现时’;‘过去’就在‘现时’里,不是已经逝去了而是还在活着,还依然存在。”<sup>[2]</sup>这些说法,有一个相同的价值指向,即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不应再采取彻底批判的虚无主义态度,而应该接续传统、返回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

进入90年代后,基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双重影响,作家们开始有了更加明确和自觉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而随着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和弊病越来越严重,质疑和批判科技工具理性、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诊治资源的倾向,也同样变得自觉。表现在作品中,一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塑造理想的传统文化人格;另一是张扬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力图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精神资源。

第一类作品,以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三部曲,杨书案的《孔子》等“诸子”人物系列,陈忠实的《白

[收稿日期] 2011-06-18

[作者简介] 张旭东(1975-)男,文学博士,南阳理工学院文法学院教师。

鹿原》等叙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故事)的小说为代表,这些作品有着共同的文化守成倾向,即都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某种程度的欣赏和肯定,都着力刻画主人公的文化人格,并且借此展示传统文化的某种蕴涵。作家们虽然不讳言传统儒家文化的僵化、保守、非人性的一面,他们的作品里对此也有深刻的表现,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传统儒家文化并非一无是处,需要完全排斥和毁弃,而是有着积极、健康的另一面,所以,他们对笔下所塑造的文化人物如曾国藩、张之洞、白嘉轩、朱先生等,多持“同情式理解”态度,甚至不乏欣赏与赞美。陈忠实的一席话可作为这些作家的共同心声:“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个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底层的民族精神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这些优秀的东西,它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它早就被另一个民族同化或异化了,甚至亡国灭种了。但是,它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还很完整的把这个民族的生存形态保存并延续了两千年,那说明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里肯定有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sup>[3]</sup>

第二类作品,以宽泛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为代表。作家们大都认为,中国的优秀传统大多保留在乡村,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需要从传统的乡土文明和伦理中找寻资源,来弥补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带来的弊端,所以许多作家在对民族文化的关照角度和价值判断上产生了与以往相比耐人寻味的转变:不再以批判为主,而代之以考察和挖掘那些散落和隐藏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在感情上,也从对乡村的严厉和严峻变为充满暖意和温情。张炜、韩少功、李锐、阎连科等许多作家都有类似的明显转变,不再着力于“国民性批判”,而是注重挖掘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追求精神价值的内容,以期“从传统美德中汲取价值、汲取‘善’的道义、汲取民族性格中隐含的生命魄力,寻找契合当代生活的‘转化’和‘整合’”<sup>[4]</sup>。在一个价值失序、大众文化独擅胜场的时代,这种对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模态的顾恋,对回归传统、重建文化秩序的热望,自然极有价值。面对有论者认为此种写作倾向可能会走向“保守”的质疑,张炜郑重地为保守正名,他在《缺少保守主义者》一文中说:“我渐渐发现了我们缺少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坚定地、一贯地固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确是陈旧的或至少看上去是陈旧的——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他是具有朴家精神的,有可靠感稳定感的艺术家。……失去了他,我们的文

学就失去了必要的弥补,失去了可信的揭示,也没有了必要的参照。”<sup>[5]</sup>张炜勇敢地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居,标志着许多作家开始认识到文化守成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就更加主动地坚守本土精神,弘扬本土传统。

## 二、反思工具理性,张扬人文价值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内涵粗略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现代性”,一种是“审美现代性”。所谓“启蒙现代性”,是以科技工具理性和现代进步理念为标志的西方工业化发展模式,它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开拓了个体的自由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异化、感性匮乏、道德沦丧以及信仰失落等诸多问题,因此,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对它的反思和批判从未间断。弗洛姆认为,现代人“努力地工作,不停地奋斗,但他朦胧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全是无用的。……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罗网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的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sup>[6]</sup>马尔库塞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偏颇造成人格迷失和扭曲的现象,提出“单向度的人”概念,他指出,整个单向度的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造就出了单向度的人格,这主要还不是因为恐怖与暴力,而是源于技术的进步,是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sup>[7]</sup>。另一位学者荣格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畸形的现代性模式不仅给西方造成了各种社会症状,而且也逐渐影响到了东方:“目前正在腐蚀西洋人的心灵的,是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知识上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力,拼命扩张,贪婪获取,永不满足。这种情况也流传到东方来,其势莫之能遏,其后果亦无从衡量。不仅印度如此,连中国亦不能免。以前灵魂赖以生或极力追求的东西,现在许多已消灭得无影无踪。文明的外化付出丧失了精神文化的可观代价。”<sup>[8]</sup>似此之例,不可枚举。

学者们普遍认为,片面地追求科技进步和物质发展,是以丧失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自由为代价的,为纠正“启蒙现代性”的偏颇,需要有另一种现代性对其进行制约和协调,社会才能健康、顺畅发展,这就是“审美现代性”。因此,审美现代性是作为启蒙现代性的批判者与修缮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在

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与情感追求的强调,它以主体性与个体性为内核,既有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就文学创作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富于批判性的美学精神,如展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兑、谴责科学主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侵蚀、批判资产阶级的堕落等等。具体表达上,它常以城市与乡村、社会与自然、现代与原始、理性与非理性等的对比映衬,来揭示工具理性、现代科技、实用主义的“罪恶”,反思启蒙现代性,肯定和赞美人性中的自然、温情、淳朴、野性和富有生机的一面,张扬人文精神,追求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

中国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正确地展现了这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现代人对生存和发展的理性诉求与对生命质态的感性体验之间的冲突。一方面,现代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也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社会和人性问题,这让天性敏感和忧世的作家不得不对启蒙现代性有所犹疑和反思,从而更看重审美现代性之于当今社会的意义。作家们的创作时刻要面对这一矛盾和悖论,并且要通过作品来展现它。从理性层面讲,作家们当然认肯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价值,知道走向现代化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但是在感情上,他们还是更加忧虑于功利性发展对人的生存状态所造成的异化。所以他们的作品里,鲜有对以现代都市为代表的科技工商业文明的正面颂扬,更多的是以下两种路向:一是通过揭示和批判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精神危机和人性的严重异化现象,来彰显人文精神和理性价值的必须;二是着力张扬和展现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的美好,以人本性上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以及美化、理想化了的、保留在自然山水、乡土田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温情为武器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中唯利是图的庸俗市侩主义相对抗,试图以前现代田园牧歌中的美好人性来纠正当下人性的堕落。这两种倾向在张炜(《九月寓言》)、迟子建(《芳草在沼泽中》)、韩少功(《山南水北》)、周大新(《21大厦》)、李佩甫(《城市白皮书》)、刘庆邦(《梅妞放羊》)等作家的创作里表达得非常明显。

### 三、批判城市文明,皈依乡土田园

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在中国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尖锐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而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就是要在文化总

体上对现代城市文化进行拒绝。于是,反城市文明的种种举动,就成为“审美的现代性”的主旋律。

持文化守成倾向的作家中,大部分出身乡村,虽然他们后来经过奋斗摆脱了乡土进入了城市,但对城市以及城市文化并没有产生认同感,而是仍然不无骄傲和自尊地以“乡下人”自居,按赵园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固守和坚持,“其意义不止在申明身份,更在说明性情、人生态度、价值感情、道德倾向等等”<sup>[9]</sup>。在他们看来,城市和乡村并非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他们眼中,都市不仅意味着一种非人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是堕落的化身、罪恶的渊藪。

这和中国一直以来城市和城市文化发展都不够成熟和充分密切相关。如同费孝通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10]</sup>中国历来是“乡土中国”,城市的发展缓慢,虽然自被迫进入近现代以来,城市成为实质上的政治文化中心,但“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根深蒂固,城市文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和涵养,这样,一旦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期,物质的极大丰富却缺乏精神价值理念层面的有效协调,使得城市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和弊端:物欲横流、人情浇漓、道德沦丧、灵魂焦灼。身处城市的作家们发现,“城市人在占有物质时表现出无止境的贪婪,城市似乎在不断地怂恿人们进行感官享乐,城市人肉体的每一部分都由相应的器械安置得更为舒适,相反,城市人的精神却日益怯懦、日益庸俗、日益委琐”<sup>[11]</sup>。出于对城市文明负面效应的失望和担忧,倾向于文化守成的作家们开始将审美的目光转向传统的农业文明,他们一方面揭露城市“罪恶”、批判城市文明病症,另一方面极力张扬乡村文明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并不惜以极端和偏激的方式警醒人们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在这方面,张炜、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家最具代表性。

张炜一直对“现代化”持质疑和批判态度,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肆无忌惮地侵蚀乡村田园充满愤激:“小时候灌木丛中的小路,路旁大野椿树下蓬蓬的石竹花,还有香气熏人的合欢树……想都不敢想。如果海潮腾空,把我们大家一起淹掉,我一点也不吃惊不怨怒。这是美丽的大自然的暴动。是正义。”<sup>[12]</sup>作家对城市没有什么好感,觉得它是“嘈杂”的,到处是“浩浩人流、拙劣的建筑物”,而乡村与之比较起来,却“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长和悠远”<sup>[13]</sup>,所以作家极力反对城市的无限扩张,

反对竞相攀比着建造一些浮华、拙劣的大楼,认为土地对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人无论怎么寻找和超越,只要还存在,就只能在土地上存在,只有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才会有生命的维持、延续、热情,人生也才有诗意和意义。所以90年代后他创作了大不同于《古船》的《九月寓言》、《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等批判城市文明、守望传统乡村文化的作品。韩少功同样对城市持批判态度,认为乡村才是丰富多彩的,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多少有点缺乏个性”,他的《山南水北》、《赶马的老三》等作品正是对乡村文明和文化的眷恋和礼赞。贾平凹稍有不同,在他笔下呈现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双重颓败,但归根结底,作家还是对城市文明多有批判,而对乡村的败落更多表现出一种无奈和痛惜,虽然当今的乡村也已不再是他灵魂的家园,但他仍然梦想着在乡村寄放自己的理想,为此他为读者营造了“乌托邦”一样的“神禾塬”(《土门》)。

当然,我们承认,文化守成作家在城乡关系上所做的价值判断是有所偏颇的:过多地关注了城市的罪恶和负面影响,看不到其正面价值和意义;对乡村却只展现美好、人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乡土文明中同样存在的弊端和负面因素。实际上,不是作家看不到或不愿写乡土文明的负面因素,而是在他们看来,对于当今时代的各种缺失和病症,乡土文明中那些健康的、符合人性的优美因子才足以起到疗救病症、唤醒迷狂的作用和效果,因此不惜对乡土文明进行美化,以坚守和回望的姿态,来表达对工具理性独大的批判,对和谐、良性的社会秩序和精神状态的渴望和追寻。对比来说,作家更看重的是生命的意义、审美的价值,就像诗人杨键所说,“在我眼里,一株荒草要比一幢几十层高的大楼珍贵得多,包括傍晚时分那田野的气味,那种被放倒的带着镰刀印痕的油菜杆也要比一个小区珍贵得多。”

#### 四、揭示发展弊端,呼吁生态和谐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发展,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到处蔓延,至少给人类带来了两种负面影响:一是因无止境无约束地对自然进行征服、改造、索取,造成了诸如土地沙化、乱砍滥伐、工业污染等各种生态问题;再就是功利性价值观也对正常人性造成了扭曲和戕害,产生了道德秩序混乱、人际关系虚假、生命意义缺失、终极信仰沦落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促使文化守成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反思对待自然的工具理性态度,明确表

达了“回归自然”的意愿。不言而喻,这里的“回归自然”也包含了相应的两层意蕴,指向了两个向度,一是向山川河流、土地草原等这些自然环境的回归,以之对抗以城市文明为表现形式的现代性对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侵染,二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以审美现代性的方式来纠正工具理性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恰好有许多极富价值的能够很好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如儒家的“民胞物与”、“利用厚生”思想,道家的“天人和谐”、“随性抱朴”思想等等,都可有效矫正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对待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为人类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环境生态和精神生态,所以,对民族固有文化的回归和维护也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早在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反思小说,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寻根”小说里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当时作家还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进入90年代后,随着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文化守成作家的忧虑和愤激也就越来越强烈,他们创作了大量关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小说,或批判人类对环境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过度开发,或揭示人类因无休止地掠夺自然而造成的环境破坏情状,或缅怀原始状态下的大自然以及在这种自然状态里的朴素、真挚的原始道德观念,或倡导以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价值尺度,重建一种新型伦理关系。典型的这类小说有:哲夫的《黑雪》、《天猎》等;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郭雪波的《沙狐》、胡发云的《老海失踪》等;张炜的《三想》、《九月寓言》和《刺猬歌》等;此外,这一时期大部分乡土小说作家,像李锐、张宇、李佩甫、迟子建、周大新、刘庆邦等,他们的作品里也都有明显的生态意识的呈现。

在这些作家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如同西方一样,也是充满弊端和偏颇的,社会和人心弊病丛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疏远和遗忘了自然,对自然缺乏尊重和敬畏之心,“人类的疾病千奇百怪,这其中有的就与疏远绿色的世界有关。人类的绝症已经不能依靠人类自身去根除,他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走进大自然中,平心静气,伸出他友谊的双手,与大自然里无数的手臂连接起来。”(张炜:《三想》)而以功利性的工具理性态度来对待自然,其后果必然是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人类屡次遭受到自然的报复。张炜对此可以说是既绝望又忧愤,他痛苦的呐喊催人猛醒:“屠杀吧!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对抗吧,仇视它们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为可怕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2, Vol.14, No.1

的报复!……真的,我总觉得大自然与人类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梦中苦辩》)是的,人类的确到了检讨以往对待自然的激进和功利态度,致力于营造和谐生态环境的时候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处新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几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具有文化守成的因子,这是作家们的天性使然。就像南帆所论述的:“当穷困的重轭压得人们无法抬头的时候,文学则起劲地呼吁一个富足的经济环境,起劲地论证经济变革的必要性;一旦商品市场所伴随的市侩气息开始弥漫,文学则立即警觉地告诫人们要抵制金钱对于灵魂的腐蚀。……”<sup>[14]</sup>可以说,作家们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使现代社会和人达到全面协调的发展和进步,才采取了“向后看”的文化守成立场。

### 参考文献

- [1] 吴义勤. 韩少功研究资料[C]//理学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21.
- [2] 郑万隆. 我的根[J]. 上海文学, 1985, (5): 44.
- [3] 陈忠实. 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C]//陈忠实文集(第七卷).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 398.
- [4] 雷达. 周大新小说中的善与恶[J]. 解放军文艺, 1988, (6): 71.

[5] 张炜. 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C].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6:86.

[6]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25.

[7]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张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52.

[8] 容格. 东洋冥想的心理学[M]. 杨儒宾,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89.

[9] 赵园. 地之子: 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 12.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6.

[11] 南帆. 冲突的文学[M].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0: 29-30.

[12] 张炜. 柏慧[C]//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张炜卷.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85.

[13] 张炜. 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J]. 当代作家评论, 1993, (1): 69.

[14] 南帆. 冲突的文学[M].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0: 11.

[15] 施学云, 邓仁英. 新时期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谱系及其文化内涵[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2(3): 90-94.

## On the Theme Point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Novel since New Period

ZHANG Xu-dong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yang 47300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period, cultural conservatism begins to rise again, and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writing has become more common in the novel field. To sum up, the themes of these novels mainly include following respects: upholding the local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criticizing on urban civilization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thinking and pro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tc. These novels reflect the writers’ concern on China’s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health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cultural conservatism novels; theme; traditional culture; humanism; rural ethics; ecological harmony

编辑 刘波